

权力、记忆与知识竞争

——郭象向秀《庄子注》公案再研究

于健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政治权力与名士身份深度结合的背景下，南渡以降士人的群体记忆对与政权结合紧密的中朝名士更为推崇，而疏离权力的竹林名士则在文化记忆中被边缘化。郭象《庄子注》取代向秀注的叙事，正是这种偏好的投射。同时，在东晋士人反思西晋覆亡，将中朝名士塑造为政治责任的承担者的前提下，污名化的“剽窃”叙事将批判集中于郭象，使其成为中朝士风败坏的符号载体，迎合了历史反思与政治批判风潮。此外，六朝激烈的知识竞争及其易受权力侵染的现实，为《世说新语》构拟《庄子注》公案提供了背景。叙事中权力强势方（郭象）对弱势方（向秀）成果的攫取，是士人群体对权力干预知识场域这一现实问题认知的投射。

关键词：郭象；向秀；《庄子注》；《世说新语》；名士；知识竞争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世说新语·文学》）^[1]

郭象《庄子注》剽窃向秀一说最早出自于《世说新语》，《晋书》《事文类聚》等均从其说。四库馆臣对比张湛《列子注》、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向秀注与今本郭象注后，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在相同文段之外，二者亦多有意指文句不同之处：“《晋书》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注，陈振孙称宋代已不传，但时见陆氏《释文》。今以《释文》所载校之，如《逍遥游》‘有蓬之心’句，《释文》郭、向并引，绝不相同。《胠篋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句，《释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为之斗斛以量之’句，《释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无。然其余皆互相出入。又张湛《列子注》中凡文与《庄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2]刘盼遂作《申郭篇》，综合考察了向郭各自《庄子注》目录篇目、章句要旨、后世接受三个方面，认为郭象剽窃向秀一说当为刘义庆等人编纂《世说新语》时“诬枉”。^[3]刘氏考辨详实，颇具说服力，此公案出于《世说》虚构几可定讞。¹然在辨明其真实性的前提下，这一叙事的生成逻辑，及其所映射的晋宋士人群体心态等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1 政治权力参与下的名士制造²

除了较为显著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优势之外，政治权力也是参与魏晋名士制造的重要因素。王恭所称的“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即为最典型的名士制造方式：“常得无事”指向社会地

作者简介：于健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献。Email:yjp6659573@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史视域下的汉晋《左传》学研究”（项目编号：21BZW0081）

位保障的闲暇，“痛饮酒”象征对社会风尚的迎合与个性展演，《离骚》则代表了士人普遍具备的文化素养与流行审美取向。^[4]需要注意的是，此语出自王恭之口，则暗示了在上述诸因素之外，“名士”的生成终需倚仗家族势力所导入之政治权力支持。从时人称其“读书少”来看，王恭的文化水平或许并不足以跻身晋宋核心名士圈，^[5]其成名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正是太原王氏的祖荫，以及他活跃于晋宋之际政坛带来的影响力。

自西晋建国起，作为司马氏集团统治基础与笼络对象，世家大族被给予了诸多政治特权，部分特权如选官等又巩固了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垄断。^[6]东晋门阀政治的运作，使得世家大族对权力的控制与行使相较中朝更为强势，甚至出现了家族内部的权力流转直接影响政权正常运作的情况。^[7]在此背景下，名士制造难以脱离政治场域，其他要素亦在相当程度上为权力所形塑。政治权力深度参与了名士制造，并最终将名士内化为政治的一部分：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世说新语·排调》）^[8]

考诸史实，魏晋名士多兼具社会名流与当朝政要双重身份，³其文化交流活动常与政治精英集会重合，甚至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意涵。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新亭对泣”：“每至美日”“藉卉饮宴”表明，新亭集会的性质是娱乐而非严肃的，是一次文娱活动而非政治集会。但被“言语”收录的周王对答在揭示参与人不同心态的同时，直接指明了这次集会的政治底色。^[9]娱乐本质反而为基于动荡局势而生成的政治情怀所掩盖。此外，还存在部分借助政治权力强行制造名士的极端情况。⁴凡此种种，都证明了政治权力对名士塑造，已经渗透得相当之深。

2 《世说新语》的重中朝、轻竹林倾向

政治权力与名士身份的紧密勾连，深刻影响了后世士人对前代名士的追忆与想象。在群体意识与社会现实的双重作用下，理想化的名士形象被认为应与政治权力密切结合，由此衍生出名士在群体记忆中的分层现象：与权力关系密切者易获更多关注与正面评价，疏离者则易被边缘化。⁵这一倾向在《世说新语》对竹林名士与中朝名士的差异性载录中可得印证：

（袁）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世说新语》刘孝标注）^[10]

袁宏划分的名士群体在魏晋政治中的表现可列为下表：

表 1·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与政治权力亲密度对照表

	名士群体	与政治权力亲密度	备注
嵇康	竹林	低	抵制典午，拒绝合作
阮籍	竹林	低	缄默避祸，消极抵抗
向秀	竹林	低	失图入洛，仕宦不显
山涛	竹林中朝之间 ⁶	高	“山公启事”，器重朝望
刘伶	竹林	低	醉酒避事，“以无用罢”

阮咸	竹林	低	武帝弃用，荀勖嫉恨
王戎	竹林中朝之间	高	琅琊王氏，位列三公
裴楷	中朝	高	河东裴氏，掌权中书
乐广	中朝	高	朝望所在，结亲成都
王衍	中朝	高	琅琊王氏，历任三公
庾敳	中朝	高	颍川庾氏，党附东海
王承	中朝	高	太原王氏，党附东海
卫玠	中朝	中	卫瓘之孙、王济之甥、乐广之婿，虽本人仕宦不显，但在家族网络的影响下与当权者联系密切
谢鲲	中朝	高	谢鲲先依附东海王司马越，又与出仕王敦幕府，深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如表可见，由晋宋人划定的中朝名士无不仕宦显达，任职机要，或与核心权力掌控者关系匪浅。而竹林名士除了活跃于中朝的山、王之外，其余诸人在魏晋易代的政治高压下，对司马氏政权多持消极规避态度。显然，中朝名士更契合晋宋士人对“名士-权力”关系的认知范式，故在其群体想象中更易引发共鸣与偏好。

表 2·《世说新语》对中朝名士与竹林名士关注度比较（局部）⁷

	《言语》	《文学》	《赏誉》	《品藻》	《容止》
竹林名士	2 则	3 则	6 则	0 则	4 则
中朝名士	6 则	14 则	17 则	5 则	11 则

从《世说新语》中篇幅较大，且兼录竹林、中朝诸人事迹的门类的记载情况来看，与权力关系更亲密的中朝名士，在重要门类中所获关注度明显超竹林名士。晋宋士人重中朝、轻竹林的倾向由此可见一斑。⁸ 晋宋士人以及《世说新语》编纂者都是与政治权力合体的社会精英，他们自然更倾向于认同能为其生存方式提供历史合法性的中朝名士，进而在关于“名士”的群体想象中赋予其中心地位。反之，竹林名士大多疏离权力，其生存方式构成了对晋宋士人依附政治权力的否定，故在记忆中中被相对忽视。即使“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11]竹林名士仍然会被依附政治权力的名士们以“先辈初不臧贬七贤”“好事者为之”等方式予以否定。

[12]

与之这一倾向相呼应，在《世说新语》所呈现的文化记忆中，名士文化的传承脉络是按照“正始-中朝-南渡-晋宋”的顺序建构的：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世说新语·言语》）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丞相与殷共相往反……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世说新语·文学》）

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世说新语·赏誉》）^[13]

可见，无论南渡后的士人们是在何种语境中展开昔日名士文化盛况的追忆，竹林名士都隐约被排斥于“名士”之外。换言之，晋宋人自恃的文化正统，在他们的构拟中完全承自中朝，而中朝则上继正始，与竹林名士并无干系。但事实上，竹林众人尤其嵇、阮及其作品之于魏晋文化的意义，并不亚于王、何，更远在中朝王衍等人之上。^[14]对竹林名士的选择性遗忘，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南渡士人以及包括《世说》编纂者们在内的晋宋士人，确实存在着重中朝、轻竹林的倾向。

3 《庄子注》公案新解：文化权威的“转移”叙事

《世说新语》构拟的《庄子注》公案，或许正是上论重中朝、轻竹林倾向的另类表现。名士的清谈活动最初依据的经典是《老》《易》而非《庄子》。《庄子》进入魏晋名士的精神世界始于阮、嵇，⁹成为玄学经典则是从向秀作注开始的。^[15]向秀注能够压倒司马彪、李颐诸家，“大畅玄风”，影响力保持至南朝末年，足证其为一部优秀的《庄》学著作。郭象注稍晚出，作为中古《庄子》经典化的最后一环，其学术地位亦毋庸置疑。^[16]虽然二者思想确多有契合之处，然张湛《列子注》所引向义与今本郭象注存在差异，且张湛常向、郭分引，可知玄学语境中二者论理各具特色。^[2]且六朝文献多“向郭”并称，或单独引向注观点，这表明郭注虽为后世所推重，但至少隋唐前并未完全取代向秀注。^[17]总之，在六朝学术语境中，向郭二人间不存在王弼何晏式的优劣长短比较，二人的《庄子注》的思想深度与学术成就并未有明确的高低分判。¹⁰

然如前所述，二人所属之名士群体（竹林和中朝）因与政治权力关系迥异，在晋宋士人的群体记忆中地位悬殊。在偏爱中朝名士，忽略竹林名士这一群体意识先入为主的前提下，《世说新语》的编纂，或许预先就存在着潜在的重郭轻向立场。在学术成就相当的前提下，如何凸显此立场成为了构拟叙事关键。“《庄子注》公案”通过设计“剽窃”情节，在承认向秀“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实现了一种文化权威的“转移”：魏晋士人文化以玄学为主体，而西晋时庄学正为玄学大宗。在此背景下，郭象将代表此时庄学最高成就的向秀《庄子注》据为己有，不仅全盘接收了向秀学术成果，更在叙事中“取代”向秀，成为魏晋文化权威的新象征。而在《世说新语》的构拟下，由于“剽窃”情节的成立，向秀依托其注获得的文化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被消解，最终内化为郭象“清辞遁旨”“王弼之亚”的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1]本为竹林名士所承载的学术权威光环，在想象中被转移至中朝名士郭象身上。

建立于“剽窃”之上的“转移”叙事，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南渡、晋宋士人对中朝名士的偏好。向秀早年从嵇康、阮籍游，在嵇死阮屈之后“失图入洛”，一生仕宦不显，是司马氏政权中的零余者。郭象依附东海王司马越，一时权势熏天。不同政治处境的二人，其作品在《世说新语》叙事中一失一显，与前论重竹林、轻中朝倾向形成了微妙的对应。中朝名士郭象通过剽窃，使己注取代了竹林名士向秀之作并自此名声大噪，构成了群体想象中文化权威在中朝名士而非竹林名士的微妙隐喻。然假使《世说新语》按照正常的学术迭代逻辑展开叙事，《庄子注》公案无疑漏洞百出，难以成立。故而只有当竹林名士的文化成就被“提取”并“赋予”中朝名士后，《世说》编纂者对后者的特别关注才能落实并固化于文本中。预设的偏爱立场导致群体想象在分配记忆中的文化成就时，必然倾向于将其归于更受关注的特定对象，而“剽窃”叙事遂成为《世说》编纂者等晋宋士人满足此心理需求的合理虚构。

4 “剽窃”与“清谈误国”

中朝名士由于与权力的亲密结合，而被同样身兼政治精英与文化名人的晋宋名士欣赏，进而在其群体想象中获得了偏爱与特别关注。但社会身份与生存方式近似性带来的好感并不能完全主导晋宋士人对中朝士人的态度。上节分析的“转移”叙事虽体现了对中朝名士的偏爱，然其具体方式“剽窃”，却隐含着强烈的道德贬斥。¹¹《世说》编纂者舍弃其他可能采用的，更正当的虚构方式，表明他们在偏好之外，对中朝名士亦怀有相当程度的批判态度。

《世说新语》的消极态度或与东晋士人的历史反思风潮有关。永嘉之乱，愍怀受辱给予了士人极大的精神创伤，反思西晋乱亡由此成为南渡后的思想主题之一。^[18]中朝名士在乱局中表现的政治无能、冷漠心态与放荡肆恣，被认为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倾辘张，困於逆乱，国破家亡，亲友调残……然后知聘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刘琨《答卢谡诗》书）^[19]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20]

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加有老庄之俗，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至今朝士纵诞……以至倾国。（《晋书·陈颙传》）^[21]

批判中朝名士逐渐融入了东晋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朝人溺于虚诞的士风，以保身为务的心态，对声名与财富的狂热，瓦解名教的放荡行为，软弱无能的政治表现等等特质，在各种叙事中都认为应当对中朝倾覆乱亡负责，即所谓“清谈误国”。¹²批判与抵制中朝士风，构成了以创伤记忆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正确”。这种“反思”本质上是特定时代集体心态的投射，它的焦点并非史实本身，而是时人关于中朝倾覆的回忆与情绪。郭象作为中朝名士翘楚，又是八王之乱的参与者，自然成为理想的批判对象。即使郭象个人行迹未如王衍、山简般恶劣，就事实而言也不应对西晋的乱亡负主要责任，南渡士人也依旧会在“反思”氛围中，将归纳出的中朝士人普遍问题集于其身。换言之，作为中朝才俊的郭象为士人的群体想象提供了悲愤情绪的发泄口。即使主流价值认可了郭象作为名士的文化地位，在受创伤记忆驱动的“反思”的影响下，郭象的形象依旧会被人为地赋予极大的消极色彩。

综上所述，《世说》编纂者在维持对中朝名士关注的同时，以“剽窃”情节为中心构拟郭象事迹，或是对批判中朝名士思想风潮的回应。郭象在此成为“中朝名士”问题之符号化身，“为人薄行”以及“窃注”行为，承载了南渡后士人群体对中朝士风败坏的印象，满足了针对性的历史反思需求。郭象是否确实抄袭了向秀注，此时已非士人的关注重点：在《世说》叙事能迎合群体意识关于中朝名士的负面记忆的前提下，作为读者的晋宋士人并无深究相关叙事真实性的动力。此即南朝向、郭注并行而《庄子注》公案仍能流传的深层心理机制。

5 推论：作为知识竞争映射的《庄子注》公案

除上论诸因素之外，《庄子注》公案极有可能也与六朝知识至上的社会风气，以及引发的激烈知识竞争

有关。^[22]东汉经学体系崩解后，知识资源多元化，士人竞相积累、展示新知以博取文化资本与社会声望。¹³六朝特有的知识竞争活动在此背景下蓬勃开展，博物学、玄学、文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中的辨论与争胜即为此类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结果往往关乎士人最看重的文化地位、名士尊严与社会形象，这类知识竞争大多十分激烈，趋近白热化。按《世说新语·文学》：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荀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

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23]上举《世说新语》详细、生动的描写，足以证明知识竞争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无论在朝在野，为僧为俗，都对知识竞争中的优胜极其执着。为了维护尊严，争夺名誉，即使将一般的知识交流导向尖锐的人际矛盾也在所不惜。就知识交流的氛围而言，在原有的优雅潇洒之外，“焚舟济河”“云梯仰攻”式的对抗性越发凸显。^[24]在此背景下，思想观点多有重合的向、郭《庄子注》，极易诱发后世基于竞争逻辑的推想，即后起之秀郭象为超越前辈，攫取学术地位而不择手段，“剽窃”了已经成名的前辈向秀的作品。《世说新语》中类似的虚构，如马融与郑玄的暗杀事件，服虔与郑玄、崔烈的窃听事件等，或许都是浸润于激烈知识竞争氛围中的晋宋士人群体文化记忆的映射。^[25]关于竞逐优胜过程的残酷性与对抗性的记忆，构成了士人对知识竞争印象的一部分，最终通过群体想象凝聚生成的《世说新语》表现出来。

此外，如上所论，名士往往同时也是当代政治精英，名士多兼有政治精英的身份。本应独立于权力的知识竞争，常因权力介入而为之所异化。较为典型的例子是《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矍如生母狗馨。”^[26]

桓温不善清言，其气质和与之同时的当代名士大不相同，一般被视为单纯的政治精英。但在此次知识竞争中，桓温却自认为自己相较王濛、王述占据了某种学识的优势。王述“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本非文化名人。^[27]但王濛作为东晋清谈领袖，“语甚不多，谓有令音”，^[28]也被桓温鄙薄，就很值得思考了。从《世说新语》的记述来看，此次的竞争的主角当是王殷二人，余者学识未能有所表现，即所谓“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故而桓温称许谢尚，又自视颇高，贬低二王，着眼点或许并非学识参差，而是四人此时的政治处境：桓温此时已袭父爵、尚公主，又在司马岳（晋穆帝）幕府内任内史，声位渐显。谢鲲之子、长史谢尚与其地位相近。此时尚为相府掾属的二王无论是声誉还是地位、权柄，都远在桓温之右。因此笔者判断，“桓

胜于王”在此语境中的成立，或非知识博弈的结论，而更可能是由政治地位差异引发的轻视态度在发挥作用。

南朝类似的情形亦屡见不鲜：鲍照因宋孝武帝的嫉妒而自秽，梁武帝对刘孝标长期抱有厌恶与不满，都是政治权力渗透并影响知识竞争的结果。^[29-30]名士与政治权力的密附关系，导致竞争的优胜往往不取决知识竞争本身，而为权力压制所取代。虽然权力的介入未必完全主导竞争的结果，但获胜方与失败方的政治处境无疑会影响知识竞争的开展和终结。

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断，《庄子注》公案的生成或许也与晋宋人对权力干预知识竞争问题的关注有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对晋宋人而言，与《世说新语》情节几乎完全相同的剽窃事件，在现实中确实发生过：

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徐广传》）^[31]

显然，何郗之事与《世说新语》构拟的向、郭《庄子注》公案如出一辙。虽然二者逻辑相反，但其根源都在于政治权力对知识竞争的干预：知识竞争中的弱势方分别借助正向和反向政治处境的优势压倒优势方以争胜，并一致地采用了“剽窃”这一极端且卑鄙的方式。何郗二人之事与《世说》成书相去不远，《世说》的编纂者很难对此事完全无知无闻，《庄子注》公案生成极有可能与此相关。

在《世说》构拟的叙事中，门户不显，作为司马氏王朝的零余者向秀代表政治中的弱势方，“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的郭象则是强势方。后者凭借权力优势“剽窃”前者成果，正是权力的不正当介入颠倒知识竞争中强弱关系的典型图景。在某种意义上，对晋宋以降的士人而言，《庄子注》公案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虚拟了一个与之记忆或想象相符的故事，也在于为群体对现实问题的认知与忧虑提供了投射的载体。“剽窃”甚至成为了后世知识竞争双方相互攻讦的手段之一，但与晋宋士人基于切身体会而引起的对这一问题的关照已有了很大的不同。¹⁴

6 结论：虚构叙事、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

作为“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汇集了晋宋士人群体对汉魏以来社会生活的认知，和关于前代名士的记忆。当魏晋风流于晋宋之际渐成追忆，《世说》在记录史实之余，不免以当世之观念和想象去重构乃至虚构前代故事。这类叙事虽非信史，但它们的生成与流传深植于特定的群体意识和社会心态，自有其历史合理性。¹⁵

上文讨论的《庄子注》公案即为一典型案例。在政治权力与名士身份深度绑定的社会结构下，南渡以降士人的群体想象偏向与政权结合紧密的名士群体（如中朝名士），而相对疏离者（如竹林名士）则被边缘化。郭象注最终取代向秀注大行于世的叙事，正是此权力偏好心态在学术领域的投射。同时，南渡后反思西晋覆亡的思潮，将中朝名士塑造为政治责任的承担者。污名化的“剽窃”叙事，巧妙地将批判矛头集中于郭象一身，使之成为中朝士风败坏之符号载体，迎合了时代性的批判需求与心理倾向。此外，六朝知识竞争的激烈化及其易受权力侵染的现实，亦为公案生成提供了背景。叙事中权力强势方（郭象）对弱势方（向秀）成果

的攫取，成为群体对权力扭曲知识场域这一社会问题的认知性表达。因此，《庄子注》公案虽非史实，然其作为晋宋士人群体想象与历史心态的结晶，深刻揭示了权力场域如何形塑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书写。剖析此类虚构叙事背后的社会心理逻辑，正是深入理解《世说新语》史料价值及其所反映时代精神的关键所在。

注释

- ¹ 此外，王葆珩在馆臣结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今本郭象注中，尝试离析了屠入其中的向秀注文，并将双方文本内容作了比较，为向、郭注相互独立，不存在剽窃抄袭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参见王葆珩. 黄老与老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35-345. 关于《庄子注》公案问题的其他辨析，另可参见刘运好. 郭象《庄子注》非窃自向秀再考辨[J]. 皖西学院学报, 2001, (01):55-59; 康中乾. 对向、郭《庄子注》疑案的一种判定[J]. 人文杂志, 2005, (05):35-38; 李智福. 郭象其人其学重估[J]. 中华文化论坛, 2018(10):103-112.
- ² 尤雅姿《魏晋士人之思想文化与研究》“绪论：魏晋士人的社会特性与社会渊源”，同样关注了政治语境中的“名士制造”。但尤书更侧重于讨论士人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如何在政治变动中延续并不断发展扩大，以及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源之于名士身份认同的意义所在，与本文涉及的问题有所交叉但又略微不同（尤雅姿. 魏晋士人之思想文化与研究[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8, 1-5）。
- ³ 《世说新语·言语》：“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92-93）《世说新语·品藻》：“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同上书，561-562）除杜毓外，王衍、乐广、裴頠、张华、王戎、周恢无不是备受文化界与社会舆论推崇的“名士”。同时，他们在西晋政治中也相当活跃，甚至多处于权力斗争的核心。
- ⁴ 并非所有门阀士族都具有可称名士的文化素养与人格品质，但利用权力压倒其他名士以完成自我标榜并非难事。比如庾亮缺乏“一丘一壑”的才情，又兼“胸中柴棘三斗许”，本不具备成为名士的学识与素养（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568, 911）；但时论仍以名士视之，主要看重的正是他外戚，执政大臣和重镇刺史等多重尊贵身份（可参见《世说新语·容止》“庾太尉在武昌”条，同上书，682页）。而当交际的名士政治地位高于庾亮时，他的名士形象就很难立住，“公论居右”和“以尘污人”即为此例（同上书，567, 912）。可以认为，庾亮得称名士的最大资本并非个人素质，而是其掌握的政治权力。
- ⁵ 《世说新语》是晋宋士人关于汉魏至东晋历代士人的记忆的载体和结晶：当晋宋士人面对前代文化传统时，需通过系统化的言行辑录实现记忆传递。《世说》以叙事汇编形式，将零散的个体轶事整合为可流通、可阐释的记忆库，使流动的口头记忆固化为稳定的文本实体。而在记忆库建立的过程中，编纂者对原始素材进行价值筛选与框架编码。这种分类不仅是技术性整理，更是以晋宋观念重新诠释汉魏历史，将多元名士形象纳入符合晋宋士林认知的阐释体系，使文化记忆在重构中获得范式化定型。“载体”和“结晶”共同构成文化记忆从流动到固化的完整逻辑链。关于本文涉及的文化记忆相关理论，可参见（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59-178, 412-491; （美）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 历史、记忆与书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98-117, 132-164页。
- ⁶ 山涛虽为竹林名士，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西晋泰始年间及以后、与中朝名士交际频繁。名归竹林而行属中朝，故在此将其界定为活跃于两大名士群体之间的特殊人物。王戎同理。
- ⁷ 如何界定《世说》条目的关注对象或有争议。以叙事最终的落脚点和评论对象为标准来确定相对较为直观。如王衍评山涛一条，由于评论对象是竹林名士，故当视为《世说》对竹林名士的称颂而非是对评论者王衍的表现。
- ⁸ “任诞”“栖逸”二门中对竹林名士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但“任诞”在晋宋语境中本为贬义，而“栖逸”在永嘉战乱频仍的背景下确难以实现。这两门中所表现的竹林名士奔放洒脱的个性特质与远离世俗的隐逸精神在晋宋朝隐成风、“名教自有乐地”盛行的环境中未被认同，反被视为“俊伤其道”。故而两门虽然对中朝名士的关注弱于竹林，但与重中朝、轻竹林的基本倾向并不冲突。
- ⁹ 按《经典释文》，向秀《庄子注》成书前，已有晋议郎崔譔所撰《庄子注》。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引“秀本传”，称向秀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云”，说明向秀对崔注的接受是他研习《庄》学的重要基础。但从目前可见的崔譔注佚文来看，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名物解说和字词训诂，与司马彪相近，而与士人所醉心的玄学相去甚远。
- ¹⁰ 《魏氏春秋》：“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217）虽然此评论中王何二人各有所长，但“自然”作为特定的时代精神无疑比文辞优长更胜一筹。这一评论隐藏着王胜于何的学术判断。但向郭二人的《庄》学成就，至少在《世说新语》背后的晋宋士人想象中，并无此类比较。
- ¹¹ 在《世说新语·文学》中，以学术权威与文化成就为核心的“转移”叙事不乏其例，如郑玄服虔《左传注》、何晏王弼《老子注》都相当典型。但就方式而言，向秀郭象《庄子注》的“剽窃”显然带有的明显消极倾向与贬抑色彩。
- ¹² 关于“清谈误国”的相关史实，陈寅恪已有归纳。参见万盛楠整理.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46-52。
- ¹³ “知识”可以视为一个宽泛概念。除最受知识史关注的博物之学及其带来的使事用典风气之外，玄学也应当归入六朝知识范畴之内。且随着佛道宗教知识的加入，作为知识领域的玄学受到的关注于晋宋间相较于正始时期有增无减。

¹⁴“剽窃”甚至成为了后世知识竞争双方相互攻讦的手段，但与晋宋士人基于切身体会，而引起的对这一问题的关照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北齐书·魏收传》：“始收与温子升、邢邵称为后进。邢既被疏出，子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鄙邢文。邢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仿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李百药撰. 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492）魏邢之争虽然是文学争胜，但二人文学批评中的相互倾轧无疑与当时特殊政治背景，以及邢、魏在政治斗争中所处的胜负形势直接相关。文学争胜的背后依然能看到政治权力运作的影子。

¹⁵东晋会稽士人提出“竹林七贤”，《世说新语》又尽载其轶事即为此构拟的实例。详论可参见王晓毅. “竹林七贤”考[J]. 历史研究，2001，(05)：90-99+190；韩格平. 竹林七贤名义考辨[J]. 文学遗产，2003，(02)：25-31+142。

参考文献

- [1]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26-227.
- [2]永瑢、纪昀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6，1939-1940.
- [3]刘盼遂. 刘盼遂文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64-166.
- [4]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842.
- [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550.
- [6]刘啸.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J]. 许昌学院学报，2005(06)：23-28.
- [7]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24-332页.
- [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883.
- [9]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01.
- [10]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29.
- [11]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482.
- [12]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594，702.
- [13]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65，233，496.
- [14]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97-126.
- [15]李延仓. 道体的失落与重建——从《庄子》、郭《注》到成《疏》[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4-27.
- [16]余敦康. 魏晋玄学史（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03-407，427-436.
- [17]王葆琰. 黄老与老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39-344.
- [18]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267-283.
- [19]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1977，355.
- [20]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920-921.
- [21]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93.
- [22]胡宝国. 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20，163-201.
- [23]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41，247-248，252-253.
- [24]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50，238.
- [25]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07-208，211，213.
- [26]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33.
- [27]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521.
- [2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 世说新语笺疏（典藏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15，539.
- [29]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8，612.
- [30]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9.
- [31]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59.

Power, Memory, and the Contest of Knowledge: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uo Xiang and Xiang Xiu Commentary on the Zhuangzi Controversy

YU Jianping, FANG 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identity of famous scholar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iterati after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Jin dynasty revered those mid-Jin (Zhongchao) scholars who we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regime, while marginalizing the Bamboo Grove scholars who remained aloof from power in cultural memory. The narrative of Guo Xiang's *Commentary on the Zhuangzi* replacing Xiang Xiu's *commentary* reflects this preference. Meanwhile, as Eastern Jin scholars reflected on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Jin and cast mid-Jin scholars as bearers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the stigmatizing narrative of "plagiarism" focused criticism on Guo Xiang, turning him into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ral decline of mid-Jin scholars, thereby aligning with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political critique. Additionally, the intense intellectual competition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its susceptibility to political interference provided the context for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Shishuo Xinyu)* to construct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Commentary on the Zhuangzi*. The narrative of the powerful (Guo Xiang) appropriating the work of the marginalized (Xiang Xiu) reflects the literati's awareness of the real-world issue of political power intruding into the intellectual sphere.

Keywords: GUO Xiang; XIANG Xiu; commentary on the Zhuangzi; Shishuo Xinyu; famous scholars; intellectual competition